

阿Q越界日本九十年

赵京华

【摘要】本文聚焦《阿Q正传》在日本近一个世纪的跨文化传播,分别梳理文本翻译、戏剧改编和学界研究三个方面的情况。重点考察日本人认识的三条路径,即反思阿Q表现中国人乃至人类普遍的性格弱点,强调其与现代革命的深层关联,以及从亚洲历史经验出发肯定其体现“千古之民”生活智慧思考路径。力图透过以上分析,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存在价值和特有力量,加深理解鲁迅文学丰饶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阿Q正传》;日本鲁迅研究;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原文出处】《现代中文学刊》(沪),2021.5.60~6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东亚传播史研究”(项目编号17BZW146)的阶段性成果。

《阿Q正传》诞生于中国已经百年,而它在邻国日本的“越界”旅行——从译介到评论乃至戏剧编演等大众层面的传播,也大致有了90余年的历程。阿Q是诞生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土壤中的“这一个”,身上带着民族久远的历史记忆和近代遭逢危机而奋起革命的深刻烙印。同时,也是受到世界性关注的带有某些普遍品性的经典人物,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在阿Q身上发现自己,从而获得反思、改革和超越自身局限的力量。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经典的存在意义和特有力量。而我们透过阿Q越界日本的历史回顾,可以了解日本人接受鲁迅及其文学的独特方式,亦能加深理解这部作品丰饶的“世界意义”。

与欧美世界相比,日本翻译《阿Q正传》的起始时间略迟但完成后居上,不仅有多个译本问世且在二战之后的特殊时期里形成了戏剧改编、公演的持续热潮,而学术探索则在厚重的鲁迅研究传统之下不断推陈出新,形成前后关联、逐步拓展和深化的认识成果。中日两民族历史上同属于东亚汉字儒教文化圈,但又时时显示出相通的区域文化传统之下民族精神气质上的种种微妙差异,近代以来两国的不同发展更促使遭逢“战败”的日本人在阿Q这一镜像中照见自身的悲剧命运,从一个冤死于革命后的社会与权力秩序的囚徒故事^①中发现中国革命的内

在逻辑,并在比照自身的近代道路之际开出不同于中国人的自我反省与超越的路径。

受到早期中国评论家的影响,在《阿Q正传》认识上日本也有反思阿Q表现中国人乃至人类普遍的性格弱点和强调其与现代革命的深层关联,这样两种大的认识路径贯穿始终。但是,细微处又能见出日本人结合自身困境而达到“阿Q就是可耻的我”之认识深度,或者从启蒙与革命双重视角展开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也有不受学界固定观点束缚而放开视野,看到阿Q体现了亚洲“千古之民”的生活智慧且具有强韧生命力的一面,或者将转祸为福以消解身心压力的“精神胜利法”视为一种非自觉的生存方式予以积极评价的观点出现,从而照亮了阿Q性格中积极的肯定性的一面。这些认识既与日本人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追求息息相关,同时也暗自连接着东亚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千年以上的生命体验,启发我们思考阿Q精神中所积淀的亚洲底色,并重新认识《阿Q正传》文本的开放性和多重对话的可能。

以下,我将梳理《阿Q正传》文本在日本的译介过程并追溯其戏剧改编、公演的大致情况,之后重点考察学者和一般读书界解读《阿Q正传》的多重视角及其独特观点,从现实、历史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去体会日本人的心路历程。

一、《阿Q正传》的日译及其戏剧改编

有关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日本学者如丸山升、藤井省三等已做过充分的梳理工作,但由于时间跨度长且历经战争和社会动荡而出版形态十分复杂,单就《阿Q正传》一部作品译介过程的整理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据我个人了解,以译者为计算单位,从1929年到2008年的80年间,《阿Q正传》至少有10个日译本问世。如果再考虑到这些版本的不断重印,其在日本广泛传播与跨时代阅读的盛况,可想而知。它们是:井上红梅本(1929、1932)、长江阳本(1931)、松浦珪三本(1931)、山上正义本(1931)、增田涉本(1933、1935),以上为鲁迅生前也即日本战前出现的版本;战后则有田中清一郎和中泽信三合译本(1952)、竹内好本(1953、1956)、驹田信二本(1978)、丸山升本(1984)、藤井省三本(2008)等。

其中,战前的井上红梅本和增田涉本,战后的竹内好本值得详述。我们已知,作为五四新文学引人瞩目的作家鲁迅的作品早在1922年就有了日译,但那是周作人所译《孔乙己》且发表于日本人在中国所办《北京周报》上,《阿Q正传》在日本国内发表的最早译本则是井上红梅1929年所译《支那革命畸人传》。考虑到《阿Q正传》早在1926年就有了敬隐渔的法译本、1929年有了王希礼的俄译本,可以说日语翻译略微滞后。而井上红梅这位初通中国文化以宣传吃喝嫖赌戏的“支那趣味”闻名的中国通成为《阿Q正传》的最早译者,也的确始料未及。难怪收到译者赠书的鲁迅,感到失望而表示无可如何。^②不过,如小说改名“支那革命畸人传”所示,这个糟糕的译本却也暗示了日本接受该作品的大时代氛围,即1930年代前后中日两国普罗文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势。就在井上红梅前后,另有3个《阿Q正传》日译本同时出现于1931年,译者均属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阵营。而山上正义本更直接得到鲁迅的校阅,作为“国际普罗文学丛书”之一出版,目的在于声援中国左翼作家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龙华事件”之后)。这种中日联手推动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趋势,也形成了丸山升所言战前日本认识《阿Q正传》的两条路径之一,即从左翼立场出发以阿Q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为中心的论述。山上正义本的“解说”就明确

指出:阿Q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作品以辛亥革命时期某个荒村发生的事情为原型,解释了这个革命的本来面目。“所讲述的是‘民国革命’这一运动在一个荒村里如何受到传统势力的抵制而遭到妥协和欺骗,最终没有获得实质上的变革而失败的过程”。^③这可以视为日本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价,明显受到了中国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创造社的影响。

丸山升所言认识的“两条路径”中的另一条——从改造国民性的观点出发,以“精神胜利法”为中心而强调阿Q代表了中国人落后品性的认识路径,则与岩波书店1935年推出的文库本《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编)有关。增田涉1933年开始为改造社《世界幽默大全》翻译《阿Q正传》并得到鲁迅的指导,1935年收入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后得到广泛传播。据悉,该《选集》印行10万部以上,使鲁迅其人其文在日本读书界获得了稳固的地位。^④这种“畅销”无疑跟大作家佐藤春夫领衔翻译和积极推荐有关,也在于岩波文库在一般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力,而增田涉所作解说“鲁迅传”则起到了有效的引导作用。就是说,取材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以鲁迅自身的说明为基准而强调《阿Q正传》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国民性弱点,^⑤这种观点伴随着译者带有东方传统韵致的译笔而深入到日本读者的心中。

时间跨过1945年的战败,增田涉曾推出《阿Q正传》日译的新版(1948),给被占领之下的日本及时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学的读本。然而,日本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和认识中国革命的急切需求,促成了战后鲁迅研究的纵深发展,也带动起《阿Q正传》新译本的不断出现。其中,竹内好以《阿Q正传·狂人日记》为名列入岩波文库于1955年问世的译本,则成为二战后影响最大的经典。据藤井省三介绍,包括1981年改译版在内,此岩波文库版到2007年为止共增印80次,成为不折不扣的畅销书。^⑥如果再考虑到竹内好为筑摩书房、河出书房新社等编译的《鲁迅文集》等,则可以说他的确是推动《阿Q正传》在战后日本广泛流传的最大功勋者。

另据尾上兼英记载:1953年东京大学中国史教授仁井田升曾向天皇“进讲”,题为“鲁迅的作品:藤

野先生与阿Q正传”，^⑦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讯息。就是说，自被占领结束而国家主权得以恢复的1952年前后开始，诞生于中国的阿Q也阔步走进了日本上至天皇下至一般读书界的国民大众中间。而我们从1950年之后20年间出现的改编、公演《阿Q正传》的热潮，亦可以瞥见这种盛况。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演剧运动大发展起因于激荡的社会政治斗争，而戏剧改编则在大众层面推动了经典文学的传播。如果改编的是外来文学，则这种传播也就包含着对作品的本土化和语境化的变形。因此又引来学术界的与之互动与论辩，合力推动了外来文学深入本土大众心中。

《阿Q正传》在战后日本的改编、公演，由于资料匮乏而难以把握其全貌。仅通过剧本、剧评和研究者文章等，我了解到至少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改编和公演。第一次是1952年“NHK艺术剧场”剧团创立，12月在日本第一生命礼堂举行创团公演，剧目便是《阿Q正传》。演出的盛况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据悉《演出手册》收录了鲁迅专家竹内好《〈阿Q正传〉的一点感想》、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小野忍《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演出总监中泽氏的《〈阿Q正传〉的戏剧化》等推介文字。我们通过竹内好的文章，包括研究者尾上兼英对演出的观感文字，可以窥见改编上演的一斑。这应该是日本战后第一次改编《阿Q正传》，在旧金山和约签署生效的当年作为日本全国放送公益机构的NHK其剧团创团纪念而公演，的确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竹内好的“一点感想”精彩凝练、妙趣横生。全文如下：

《阿Q正传》是谁读了都感觉有意思的小说。无以类比的有趣！虽说漱石的《哥儿》很是有趣，也赶不上《阿Q正传》。就是说，越读越有滋味，让你感到回味无穷。奥妙之外还有奥妙，而难以完全理解其意义。从这一点上讲，又是一篇难解的小说。

这算是一篇称得上幽默乃至滑稽的小说，同时又是包含着有哲理深度的思想性和阶级分析正确性的社会小说。《阿Q正传》有着这样的二重性格。

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性时代发生在中国小村庄末庄里的事件，但却达到了通往所有时代、

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阿Q这个人物的确是流浪雇农的典型，但却触及到了人性的深层而引起众人共鸣。在共鸣的普遍性这一点上，阿Q远远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之上。

小说主人公无论怎样的居人之下，但在世界文学中也没有像阿Q那样的居于最底层的人物。他是人世间最低下的渣滓，在人类中受尽压迫没有再比他更卑贱的了。而在这最卑贱的人物身上发现其高贵的人性，乃是这篇作品不灭的艺术价值之所在。

鲁迅是如何深深爱着这个可憎、无知而无道德的阿Q主人公，我们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证据。例如，描写饥饿的阿Q去尼姑庵偷萝卜的路上等段落。看到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去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阿Q知道这不是他所求的东西。这是怎样高贵的灵魂啊！正因为有如此高贵的灵魂，最后被枪毙时，从视自己为无知无谋者的所有人眼中，他得以看见狼眼睛。

小说《阿Q正传》采用的是心理倒错法，读者一开始想着观看阿Q，但不知不觉间便陷入观看者自己不正是阿Q嘛这样的错觉。在舞台上，难以展示出这样的效果。所以，看了演出的各位请一定去读原作。然后，了解一番鲁迅的文学再返回到小说《阿Q正传》。我保证，这番辛苦于思考您的人生道路肯定有益。^⑧

我相信，这样有感召力的文字对于不了解原作的普通观众肯定构成了重要的指引。例如，对《阿Q正传》艺术风格上的二重性格、人物的个性与普遍性共存的分析，对作品在最卑贱人物身上发现高贵人性的艺术价值的肯定，总之在将阿Q悄悄带离其所生存的舞台——革命中国而引向人类社会普遍性从而让观众感到与自己息息相关，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如后所述，这一方面体现了竹内好透过鲁迅作品反省自身民族弱点的倾向，同时也有力影响了战后日本的《阿Q正传》理解。另据尾上兼英的文章，观赏舞台上的阿Q而有众多观众发出大笑！可见演出效果之好。而针对总监中泽氏的“如何理解作品中的主人公完全是观众的自由”及“鲁迅生前反对《阿Q正传》的戏剧化”等观点，尾上兼英则从专业角度提出反驳和批评，^⑨学者与编导形成了互动。

第二个是久被淹没的民间剧作家霜川远志(1916-?),在1954年至1977年间致力于《阿Q正传》的改编、公演,并通过《戏剧·鲁迅传》(1974)加强背景知识的努力过程。中国学者董炳月通过《戏剧·鲁迅传》附册——演出手册,对这一过程做了大致的整理,内容相当丰富。第一,霜川远志1954年改编《阿Q正传》并公演,1977年编成《戏剧·鲁迅传》,又促成了两幕五场话剧《阿Q正传》的再次公演。第二,据附册中的《全国巡演高中一览表》显示,“剧团世代”第一次演出是在1974年,至1977年在日本110所高中巡演,反响强烈。第三,从手册里对高中生观众藤田真弓、剧作家林黑土、剧团代表津田忠彦、阿Q扮演者岛田正吾和熊野隆司等感想文章的介绍,董炳月结论道:“显而易见,剧团世代这个演出团体被鲁迅及其《阿Q正传》改变了。这种改变同时发生在世界观、人生观、舞台美学等不同层面”。^⑩而我则感到,在这些珍贵文献中亦可见戏剧化对鲁迅这部作品在日本特别是青年中所发挥的广泛传播作用。

第三次则是《阿Q外传》于1969年在东京“文学座”上演。编剧宫本研(1926-1987)是战后著名剧作家,1956年创作《我们歌唱的时候》而引起剧坛关注,其后有《反映工程》《日本人民共和国》《机械作战》和《向导》剧作问世,被称为“日本战后四部曲”。1960年代宫本研思想上走向激进革命而创作上形成爆发期,不仅推出了包括《阿Q外传》在内的《革命传说四部曲》(1971),还有《桃中轩牛右卫门的男·女·梦三部曲》(1978)问世。而“文学座”是以岸田国士为指导,由杉村春子等创立于1937年的著名剧团。另据中国学者徐东日的研究,剧本《外传》已非小说《正传》的忠实改编,其表现主题为“抛掉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勇于直面现实”。因此,宫本研大胆将小说的“自叙封套”结构改造为开放的多重戏剧结构,通过嵌入另一个“穿和服的男人(鲁迅)”主人公而将《阿Q正传》诞生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带入戏剧,形成了在十九幕十一场话剧中鲁迅与阿Q两个人物交错发展的情节线,以此构成戏剧结构的内在统一性。^⑪这样大胆的改编相当于将霜川远志的话剧《阿Q正传》与《戏剧·鲁迅传》合二为一了,对于日本观众全面把握阿Q与近代中国社会十分有效,但“大胆”也可能

造成对原作主题的偏离,成为学者的批评对象。

公演之际,鲁迅研究者丸山升发表剧评,对宫本研综合《藤野先生》和《药》以及鲁迅、秋瑾等历史人物于一炉的改编,在肯定其“展现中国辛亥革命及民众问题等原作主题,用绚丽的台词表达了自己的革命论和民众观”的同时,也对让剧中人物鲁迅喊出“新生的政府必须打倒”的口号不以为然。丸山升强调,这与实际上的鲁迅思想距离太远,正是看到了辛亥革命的结果而丢掉了以往的革命想象,鲁迅才开始重新凝视中国及其民众,才有了《阿Q正传》的创作。但《外传》改编者刻意要表达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对鲁迅革命思想的阐发有过于简单之嫌。^⑫能把鲁迅文学的诸多要素投入到一个喜剧作品中而保持基本的结构统一,这是宫本研编剧最了不起的地方。但用当时通行的“不断革命论”演绎阿Q,结果忽视了鲁迅对革命复杂性的深刻认识。^⑬

我们知道,《阿Q外传》公演的1969年正是日本“大学纷争”即反抗教育体制和国家权威的学生造反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新左翼激进反体制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不断革命论”。宫本研以此来演绎《阿Q正传》和鲁迅思想,虽有偏离原作主题之嫌却也是适应了时代大势。戏剧比小说更需要面对此时此刻的大众和当下思想课题,例如在“68年革命”发源地的法国也有人将《阿Q正传》改编为剧本,阿Q被塑造成“反英雄”“准神秘主义者”,以此尝试使民众获得自审和启发,^⑭道理是一样的。这种贴近时代氛围的改编,反而能有效地刺激受众,从而使阿Q在异国他乡阔步前行。纵观战后日本三次较大规模的《阿Q正传》戏剧改编,就有一个逐渐偏离原作主题的倾向依稀可见,这实际上是大众传播层面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阿Q正传》在日本的跨界旅行,也需要同时关注思想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

二、人类普遍性格与启蒙革命两条认识路径

如前所述,早在战前日本伴随着小说的翻译就产生对《阿Q正传》的评论。但是,鲁迅及其作品真正深入日本社会并成为民族自我反思和想象革命的思想资源,即我所谓“内在于日本思想史的他者”,^⑮还是始于二战以后。日本帝国的土崩瓦解和战败的

满目疮痍带给知识分子切肤之痛,反思国家和民众走向侵略战争深渊的种种蛮横愚行,成为思想界的重要议题。因而,《阿Q正传》表现失败的个人和民族之弱点的“精神胜利法”,首先在1950年代的日本读书界受到特别关注。正如竹内好所谓“阿Q就是可耻的我”象征的那样,此时的日本人将自身的精神创伤投射到阿Q身上,带着排除“精神胜利法”——奴隶根性的情绪解读《阿Q正传》,也便成为一般的阅读方式。然而,到了19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社会的深刻变化,战后国家重建基本完成而国民自信心得到大幅度恢复,一般读书界取代战后初期全民“一亿总忏悔”的情绪而出现从亚洲久远的历史经验出发肯定阿Q之生活智慧的观点,学术界则进而在检讨《阿Q正传》与中国革命之关系方面深入推进,由此形成了注重阿Q代表人类普遍性格弱点的思路并驾齐驱的态势。回顾战后日本《阿Q正传》解读史,可以从总体上大致归纳出这样三条思考路径。

先讨论日本学界认识《阿Q正传》的两条路径。

日本学人由对鲁迅及其文学的解读而开出民族自我反省的道路,首先体现在战后开辟了鲁迅研究传统的竹内好身上。我注意到,在战前出版的《鲁迅》(1944)中,竹内好以西方小说为标准并不看好《阿Q正传》,只寥寥数语承认其为鲁迅的代表作和“阿Q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但认为其艺术结构上存在缺欠。然而,到了战后再版的《鲁迅》(1948)尤其是以此为底本加以大幅度修改的《鲁迅入门》(1953)阶段,其立场为之一变。竹内好不仅将《阿Q正传》推到世界文学经典的高度,而且有力诠释了鲁迅对阿Q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结,点明该人物既是背负人类弱点的一般者,又是足以引起每个人反省自身“可耻”性的一面镜子。我以为,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竹内好战争末期被派往中国战场而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耻辱”体验,这体验被默默地带入了对《阿Q正传》的解读中。

而直接原因正如竹内好自述,在于当起手翻译《阿Q正传》时,随着进入作品内在世界而感受到鲁迅对阿Q的深爱之情,他才痛感到自己此前的“误解”源自“将作品仅仅作为自我完成的东西”,实际上“应该从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广度与重要程度”^⑥来

衡量一篇作品的成败。这样,一旦摒弃了西方文学的固定模式,则《阿Q正传》艺术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及其独特便得以凸显出来。竹内好发现作品的世界是一个完美的虚构艺术世界,鲁迅用嘲弄的口吻运笔开篇,但渐渐与人物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阿Q的真实世界。“很少有这样巧妙地完成从现实向虚构转换的作品”,它源自鲁迅对人物的深爱也有推动故事发展手法上的巧妙,包括源自中国传统话本的对于人物之“粗犷”描写等。从小说整体布局紧凑和以心理反应暗示故事发展来看,这又是非常“现代”的作品。

竹内好结论道:“‘阿Q’是过去,同时也是未来。即,普遍的。他是代表人类不道德的一般者,而在众人心中产生共鸣。普遍源自个别。阿Q作为可憎恶者源自鲁迅身内而由其创造出来。……正因为爱而发出憎恶。阿Q在一步步走向死亡,而且并不理解自己行动的意义,这对鲁迅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另一方面,“阿Q很滑稽。他是一个背负着如此多人类弱点的存在,让人不能不发笑。其愚昧达到了滑稽的程度。然而,这愚昧真是没有办法。我们在嘲笑阿Q的过程中,那嘲笑不知何时会凝固起来而产生深切的悲哀。同时,会涌起对阿Q的愚昧乃至允许其愚昧的东西的愤怒之情……”最后竹内好惊呼:“阿Q就是‘我’,应该感到羞耻的我!他作为可耻的我,为万人所爱。‘阿Q’是人类——人民的代名词。人民的愚昧不消除,阿Q就会持续存在。而且,出现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阿Q是不朽的”。^⑦

在此竹内好采用了非常曲折感人的“文学化”表述,但背后的逻辑十分清晰。从普遍源自个别的原理推导出鲁迅所创造的“这一个”阿Q实质上是具有人类普遍性格弱点的典型;而作者对阿Q的爱憎交织情感则引导读者从嘲笑、悲哀最终走向愤怒,从而产生“阿Q就是可耻的我”这一反思的欲望。日本学者吉田富夫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这乃是竹内好投射到鲁迅身上的自虐言辞,战后一个时期里流行于日本人中间的自虐式阿Q认识就源自竹内好。人们认为《阿Q正传》的生命力在于通过“精神胜利法”得以看到不可救药的奴隶根性,阿Q“作为

普遍潜在于人类的奴隶根性的典型,是一个应该被否定的形象……自竹内好《鲁迅》再版以来,这种对《阿Q正传》的逼视方式就成了日本的鲁迅读者们的方式”。^⑧

我们已知,《阿Q正传》自发表以来中国评论界多关注于人物性格的普遍性。沈雁冰在《读〈呐喊〉》(1923)中虽注意到了第四章以后“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问题,但依然坚信“作者的注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⑨周作人则更确定这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一个民族的类型”。^⑩后来,经郑振铎指出阿Q“人格上似乎是两个”而鲁迅给出否定性回应,到了钱杏邨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之后,“革命”问题才真正成为一个焦点,且与人类普遍性格弱点的典型说并行,至今依然制约着《阿Q正传》的解读。这背后隐含着文学研究会基于19世纪西欧文学经验和创造社、太阳社依据20世纪革命文学理论所产生的评价标准和审美态度的差异与冲突,值得玩味。

日本学者亦受到早期中国评论界的影响,在竹内好为代表的强调阿Q反映了人类普遍性格弱点的思路成为“日本的鲁迅读者”的阅读方式的同时,也有专业学者注意到阿Q与革命主体民众的关系及鲁迅的启蒙视野。尾上兼英早在1953年就曾发表文章,结合《阿Q正传》开头“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一句来讨论结尾处的“狼眼睛”所指为何,实际上是在讨论如何理解该小说的主题。针对仓石武四郎的“枪口”说、竹内好的“使其愚昧的一切人类之眼”说等,尾上兼英认为在和围观的愚昧民众之眼重叠而出现的狼眼睛中,鲁迅看到了逼使自己肩负起重大责任的先驱者之眼。^⑪这种观点的思考重点不在阿Q性格是否具有人类普遍性以及如何反思的方面,而是通过强调“狼眼睛”中有五四思想启蒙先驱者逼视的眼神这一假设,得出鲁迅是肩负着启蒙使命来创作《阿Q正传》,并通过阿Q最后被处极刑而表达了与传统道德诀别的意志。这就把讨论落实到了五四思想革命上来。实际上,这条不同于竹内好的认识路径在战后日本学界有更加学理的阐发,触及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近现代文学的特征、鲁迅小说与民间土俗传统的关系、阿Q的生命意志与革命本能

等等深层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丸山升曾在《鲁迅——其文学与革命》(1965)一书中,对竹内好所忽视的“阿Q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做了全面阐释。其中,阶级分析的观点、启蒙与民众的关系、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等问题得以凸显,形成了从“启蒙与革命”相互关联的视角认识《阿Q正传》的系统化方法。丸山升认为:《阿Q正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化之后鲁迅独自面对运动、革命、民众问题、旧社会人伦关系乃至辛亥革命的现实而做出的一个总括性的艺术呈现。作品的滑稽笔调到第四章突然中止而叙述上增加了悲剧色彩,这一转向直接与阿Q受到赵家代表的统治阶级压迫有关。这是鲁迅在创作中第一次强有力地凸显“赵家”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往鲁迅只是提到民众的不幸,而把如何在中国社会整体变化中实现变革的课题,大致是让给‘主将们’去思考的。但当自己必须亲自处理这个课题时,在他眼前就必然映现出赵家的存在乃至阿Q与之具有的关系”问题。丸山升强调,作者明确揭示了如果不能解决阿Q与民众、与赵太爷的关系问题将给“革命”带来怎样的结局,因而成为对辛亥革命和中国社会最为根本的一种批判。^⑫

如果说在上述专著中丸山升对《阿Q正传》的解读主要着眼于鲁迅“革命”意识的产生、阶级观点的形成问题,那么稍后发表的《〈阿Q正传〉的二重性》(1970)一文则同时将“启蒙”的问题包括进来,代表了作者所达到的认识新高度。在此,丸山升首先阐明中国区分“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涵义,指出“近代”阶段的思想主题为“启蒙”而“现代”阶段则在“革命”。鲁迅曾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丸山升认为如果将此理解为是在强调需要整体的真正革命,那么鲁迅确实揭示了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所在。即,“《阿Q正传》的二重主题在于,它同时提出了要克服‘精神胜利法’的‘近代’课题和要解决此课题需自下而上之革命的‘现代’课题。如果不同时解决现代的课题,那么近代的课题也解决不了,这正是中国近代史的难关。而从正面接受这一问题加以表现,……使《阿Q正传》结实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作”。^⑬

启蒙与革命,的确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核

心主题,也是百年来讨论《阿Q正传》思想艺术成败的关键之一。而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论者常常得出不一样甚至相反的结论,就在于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组彼此消长或相互压倒的矛盾关系,而未能在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上意识到此乃一体两面的问题。“整体的真正革命”必然是要同时解决“启蒙”与“革命”的课题而无法彼此分开。《阿Q正传》解读史上有所谓注重人类普遍性格弱点和与辛亥革命直接关联的两种认识方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源自没有从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最近,有中国学者正确地指出“鲁迅要表达的意见是不断革命,而非转向启蒙。这也就是说,即使一定要强调启蒙之于鲁迅的重要性,也应当在革命的意义上进行理解”。^④而不断革命,无疑是同时包含了启蒙的内涵。丸山升在20世纪70年代从综合了中国“近代”与“现代”的思想课题这一角度,对《阿Q正传》同时触及到启蒙与革命问题而达到高深艺术境界,给出恰当的评价,这的确慧眼独具。

这也预示了竹内好、丸山升之后的日本《阿Q正传》研究将摆脱“两种认识路径”各自发展的状况,而出现更加综合多元的观点。例如,木山英雄着眼于五四时期鲁迅文学写作的内部运动过程——如何创造出系列以“黑暗世界”为主题的作品,认为“先前作品中人物的无知、麻木、卑怯以及其他性格,都在阿Q身上被有意识地夸张了。以这样的否定性性格把阿Q彻底武装起来,构成了鲁迅这篇唯一长篇之作得以成功的保障,也由此作家从自己所确信的黑暗中塑造了一个黑暗的积极人物”。^⑤丸尾常喜则开拓出从传统因袭之鬼、国民性之鬼、民俗之鬼三个层面分析鲁迅小说,尤其是《阿Q正传》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民俗社会学视角。^⑥片山智行甚至提出,“阿Q是有着革命能量和无限生命力的阿米巴(变形虫)”^⑦……

三、“千古之民”的生活智慧与“我们都是阿Q”

与学界从上述两方面追寻《阿Q正传》思想艺术价值的认识路径不同,日本一般读书界尤其是从事写作的文学家们则不受知识学理的成规束缚,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更为开放自由的解读。他们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和观念感觉,不仅从“精神胜利法”中看到了源自被压迫地位而产生的自欺欺人的

否定性要素,更感受到了阿Q言行中的生存意志和乐天主义积极面。特别是在将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知识分子“启蒙意识”相对化之后,阿Q的“精神胜利法”被置于广阔的亚洲生活世界和历史时空中,获得了代表“千古之民”生活智慧的内涵,从而照亮了中国人难以看到的内在于阿Q性格中的光明面。而这种文学家和一般读书界的解读影响及于学术界,又产生了对竹内好“自虐式阿Q认识”的反思,更有新时代学者提出“我们都是阿Q!”的观点与之遥相呼应。

我最初了解到上述解读方法,是通过日本佛教大学教授吉田富夫的文章而获得的。早在1961年吉田富夫就发表了质疑竹内好“自虐式”阿Q认识的文章,^⑧认为关于《阿Q正传》的生命力在日本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即于阿Q“精神胜利法”中看到了一种不可救药的奴隶根性——阿Q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阿Q作为应否定的东西被读者接受。他不仅是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之中国农民的典型,同时也是作为普遍潜在于人类的奴隶根性典型而应遭否定的形象。然而,当吉田富夫读到作家泉大八《鲁迅〈阿Q正传〉——在今天的意义》^⑨一文后,发现在上述“定说”之外还有另一种读法。即,传统的阅读方法把阿Q置于否定的方向上,通过将其摄取到自己的内部经过反思而产生积极的力量,但这位作家却直接吸取了阿Q身上的能量。泉大八说:“我们需要看到‘精神胜利法’亦有否定和肯定的两面。鲁迅一面批判了以行动无法解决的、每天咽下失败和屈辱的民众之狡猾的内心盘算,同时也描写出转祸为福的阿Q其深层的强韧生命力,并暗示这将转换成一种实践的力量”。^⑩

就是说,鲁迅赋予阿Q以消极和积极的两面性格,“精神胜利法”不仅包含着人类自欺欺人的普遍性格弱点,同时也蕴含着逃脱命运的摆布而巧妙规避危机的生活智慧。当然,作家泉大八并没有从原理上解释这种双重性格的结构机制,他只是凭直觉意识到阿Q身上也存在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而学者吉田富夫则据此引申开来,对忽视这一点的研究界提出反问:“在鲁迅所表现的阿Q之种种‘精神胜利法’中,我们难道不是首先会感到某种爽快吗?而对其‘精神胜利法’欺瞒性的理性批判不是在这之后

才获得的吗?或者说,在阿Q愚钝的深层难道就没有要摆脱这愚钝的亮色吗?对于压迫自己的一切要以某种办法找到反击的能量,在这样的阿Q身上就没有潜藏着的某种坚强凝固的精神——不屈不挠而强韧柔软的弹性吗?如果我们将阿Q的弹性只等同于欺瞒,那么另外一些东西恐怕就会被忽视掉”。总之,阿Q并非单纯的否定性人物,比起《故乡》中的闰土来,鲁迅在阿Q身上更看到了某种前进的动量。^③

如果说,作家泉大八在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轨道而民族自信得以恢复的1960年代凭直觉感受到了阿Q性格中的积极方面,那么历史小说大家司马辽太郎于战后社会发展达到巅峰而泡沫经济初现的1980年代末对“精神胜利法”的解读,则更带有反思现代性的哲理意味。在《明治国家》(1989)一书中,司马辽太郎从现代民族国家和古老亚洲社会的矛盾冲突及知识分子与“千古之民”的关系角度,对阿Q的存在提出以下见解:“在明治初年的日本也有众多的阿Q存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阿Q,今天心中依然有这样的感情。与国家和民族道德相距遥远的阿Q正所谓千古之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比起知识分子来更是一种人类普遍的存在。至少,存在于亚洲的普遍性之中。然而,知识分子要创造‘法制的民族国家’这一高级的东西,千古之民们则被视为是低级的,对此知识分子感到了焦虑。”^④

我认为,这个“千古之民”也可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臣民”——东方漫长封建专制社会所规训出来的没有独立人格的芸芸众生。然而在吉田富夫看来,司马辽太郎是从更辽远的亚洲历史视角看到阿Q存在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所谓“国民性批判”只是启蒙知识分子从现代性角度发出的议论。实际上,在阿Q“精神胜利法”中也包含着亚洲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庶民生活智慧或乐天主义,以及以此为杠杆生存下去的积极力量。^⑤我从司马辽太郎和吉田富夫的观点中更感受到,人们一旦挣脱了启蒙观念的禁锢和现代性的思想牢笼,从更悠久的历史远景去瞭望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会得出崭新的认识。现代性的发展要求建构国土、国民、国语三位一体高度均质的主权国家,更何况在备受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威逼的“落后”地区,“进步”的启蒙知识分

子对这种“千古之民”的存在感到焦虑,认为他们身上残留着与“国民”标准不相符合的专制时代“臣民”的烙印,故而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议题而强力推行。鲁迅自然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启蒙知识分子,他写作《阿Q正传》意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明显处在启蒙思想的脉络之中。但是,正如该小说在形式上带着新旧两重的痕迹一样,主人公阿Q从其“行状”到精神性格也带着新旧两个世界的影子。不论作家的主观意识如何,在这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他所创造的人物的性格必然是新旧杂陈而复杂多面的。日本文人作家从本国乃至区域的视角看到阿Q身上隐含的亚洲“千古之民”的面影,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肩上并没有现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过重思想负担,比起作为改造的对象,阿Q更是一个秉承着东方人生活智慧的典型。

也因此,到了21世纪亦有日本学者对阿Q“精神胜利法”表现出有条件的肯定态度。代田智明在《解读鲁迅》(2006)一书中论及《阿Q正传》就指出:“精神胜利法”的确代表了人类普遍的性格弱点,但作为一种在个人精神内部处置挫折和失败的疗愈方法,又是有效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意识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我们的生存有深深的关联。在多数情况下,它被定义为人类应该克服的弱点。然而,这能否克服得了呢?需要克服吗?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阿Q的生存方式铭刻在心,自觉到我们都是阿Q”。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精神胜利法’的奥妙,虽具有减轻个人精神压力的功能,同时又是一种服用麻药会出现习惯性犯瘾的症状。因此,我们只能成为有自觉性的阿Q——有意识地承认自身的阿Q状态。‘精神胜利法’终究无法达成现实的变革。为了获得改变现实(环境)的气力,我们才需要精神上的这种处置。我们都是阿Q,是知道何谓阿Q精神的阿Q”。^⑥

我们都是阿Q,是知道何谓阿Q精神的阿Q!与泉大八和司马辽太郎的“精神胜利法”肯定论相比,代田智明的观点更为理智而有其限定。如果把“精神胜利法”抽离出“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范畴而置于个人内心领域,作为一种缓解挫折和失败感从而获得继续生存下去之力量的精神疗法(有副作用

的),则无可厚非。因为,时刻会遭遇到挫折和失败乃是无可改变的存在本身。但同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田智明也意识到,这种个人内心领域的精神疗法并不能成为公共领域变革现实的力量,我们对于“精神胜利法”的肯定需要有其明确的限定。我认为,这是新世纪代表日本鲁迅研究者《阿Q正传》解读新高点的认识,介乎于上世纪学界流行的两种认识路径之间,而与作家、读书界的理解也有相通之处,同时在哲理的层面又打开了一扇新的思考之窗。

以上,我就《阿Q正传》在日本近一个世纪的文本翻译、戏剧改编和学界、读书界的种种认识做了匆匆的回顾。阿Q越界日本的颇有深度的跨文化传播,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这部小说的世界性文学经典的价值。不同时期的日本人不仅通过小说了解到中国人的某种生存状态、精神品性和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更从阿Q身上发现自己的面影,从而提高了对现代社会、亚洲历史乃至未来人类状况的理解。日本人对《阿Q正传》的接受和理解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学经典必有其文本的开放性和多重对话的可能,唯其具有开放性和对话性,才能得到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深度解读和广泛认同。《阿Q正传》有着继续解读和研究的广阔空间,其文学经典的力量所在还有待继续开掘。从东亚同时代史的视角来看,日本人的阿Q认识也将成为可供我们共享的思想资源,而不仅仅是鲁迅文学如何在异域发生影响的问题。

注释:

- ①李国华:《革命与“启蒙主义”》,《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1页。
- ③丸山升:《某中国特派员——山上正义与鲁迅》,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76年,第123页。
- ④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东京:角川书店,1970年,第272页。
- ⑤同上,第251页。
- ⑥藤井省三:《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东京:岩波新书,2011年,第175页。
- ⑦尾上兼英:《鲁迅私论》,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第33页。
- ⑧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东京:筑摩书房,1980年,第277-278页。

- ⑨尾上兼英:《鲁迅私论》,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第31页。
- ⑩董炳月:《鲁迅形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80页。
- ⑪参见徐东日:《论宫本研〈阿Q外传〉的结构艺术——兼与〈阿Q正传〉相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 ⑫丸山升:《剧评宫本研〈阿Q外传〉》,《赤旗》1969年10月6日。
- ⑬丸山升:《剧评〈阿Q外传〉(文学座)》,《文化评论》1969年第11期。
- ⑭梁海军:《传播学视域下〈阿Q正传〉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2期。
- ⑮赵京华:《日本战后思想史语境中的鲁迅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 ⑯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第241页。
- ⑰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2卷,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147-149页。
- ⑱吉田富夫:《〈阿Q正传〉的读法》,《大安》1961年第5号。
- ⑲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 ⑳周作人:《〈阿Q正传〉》,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第10页。
- ㉑尾上兼英:《鲁迅私论》,第27-29页。
- ㉒丸山升:《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东京:平凡社,1965年,第163-164页。
- ㉓丸山升:《〈阿Q正传〉的二重性——中国的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丸山升遗文集》第2卷,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
- ㉔李国华:《革命与“启蒙主义”》,《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 ㉕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 ㉖丸尾常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
- ㉗片山智行:《鲁迅——阿Q中国的革命》,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96年。
- ㉘吉田富夫:《〈阿Q正传〉的读法》,《大安》1961年第5号。
- ㉙泉大八:《鲁迅〈阿Q正传〉——在今天的意义》,《新日本文学》1961年6月号。
- ㉚转引自吉田富夫:《鲁迅点景》,东京:研文出版,2000年,第135页。
- ㉛同上,第139页。
- ㉜转引自吉田富夫:《〈阿Q正传〉是如何被解读的》(1999),《鲁迅点景》,第158页。
- ㉝吉田富夫:《鲁迅点景》,第159页。
- ㉞代田智明:《解读鲁迅》,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95-97页。